

危机时刻的 文化想像

文学·文学史·
文学教育

■ 鹅湖学术丛书

江右学术，推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倡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迨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绪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亲约朱、陆等会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不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罗 岗 / 著

罗 岗 / 著

鹅湖学术丛书

危机时刻的 文化想像

——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

『现代「文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作为现代知识的「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简化，相反，这样的讨论更可能把问题引向深入和复杂。即使认定现代意义的上『文学』更多的时候是以『知识』形态现身，那么也需要挖掘『知识』背后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权力的『痕迹』，凸显『知识』最终可以落实储存和传授的制度性保护，寻绎『知识』在使用者和思想者的内心世界里的细微变化，并且指出『知识』在跨文化和跨语际传播中产生的误解、差异与创造性的挪用。很显然，作为『知识』的文学并非一定是凝固的和形而上学的，关键是如何发现制度中潜藏的个人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揭示出的制度与生活世界的辩证关系。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罗
岗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12(2007.8重印)
(鹅湖学术丛书)
ISBN 978-7-5392-4393-1

I. 危... II. 罗...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289 号

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

WEIJI SHIKE DE WENHUA XIANGXIANG

——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

WENXUE WENXUESHI WENXUE JIAOYU

罗岗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承印

2005年12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2次印刷

960毫米×680毫米 16开本 印张:21.75 字数:264千字

ISBN 978-7-5392-4393-1 定价:31.0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鹅湖学术丛书书目

- | | |
|-------------------|------|
|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 李学勤 |
| 中层理论 | |
| ——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 杨念群 |
| 主体弥散的空间 | |
| ——亚洲论述之两难 | 孙歌 |
|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 |
|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 陈以爱 |
|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 尚小明 |
| 自由主义之累 | |
| ——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 | 欧阳哲生 |
| 德性源流 | |
| ——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 | 李承贵 |
| ► 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 | |
| ——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 | 罗岗 |
| “学衡派”谱系 | |
| ——历史与叙事 | 沈卫威 |

出 版 人 / 傅伟中

策 划 人 / 熊 侃 国 功

责 任 编 辑 / 熊 侃

特 约 编 辑 / 国 功

装 帧 设 计 / 张 延

编辑人语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续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在学术图书出版叠床架屋之今日，要为自己操持的一套深度原创性学术专著取一个满意的丛书名称，着实费了我们几个愚钝的编书匠不少心思。某秋日，陪学界同道至铅山鹅湖书院寻踪朝圣，于习习秋风中目睹“斯文宗主”、“圣域贤关”诸多旧墨遗痕，不

禁感怀寄意,遥念起八百余年前极一时之盛的“鹅湖之会”,朱、陆辩难论诤之情形,依旧令人景行行止,温情与敬意填塞胸臆。蓦然间我们发觉:还有什么比用“鹅湖”来命名它更为合适的了?!

朱、陆所生活之宋代,乃中国文化之重要转折期与特出鼎盛期。陈寅恪先生曾推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江西,时人亦多有“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美誉。在此时空交结点上出现的鹅湖学术盛会,并非横空出世之偶然事件,而实崭露出一个思想活跃、诸说并起之学术繁兴时代,昭示着一处文化中心区域人文蓊郁、群星璀璨之阔大气象。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们从不以地域自囿,从不因地处边缘自惭,而一向努力追求胸怀中华文文学脉、放眼天下学术图景以尽当代出版人一己之学术文化担当;况且沾溉于如此悠远之地域文化资源,沐浴于千年不绝之流风遗韵,我们无法不油然对这份赐福深怀感激,并常萌生将其继往开来、光大发扬之念想。“鹅湖学术丛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与这种历史深处的人文底蕴时时在催促着我们戮力勤勉是分不开的。

要进一步说,我们坦言,以“鹅湖”为一学术丛书命名,还有深意存焉。在今天的各类辞典及史论著述里,“鹅湖之会”被简单地定义为朱熹之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之争。事实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与精神,远比历史的描述与记录丰富、深远得多。朱陆之异,首在为学工夫。朱熹指陆九渊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近于禅学,所谓“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而主张以“道问学”为重;而陆九渊则责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留情传注”、“增疣益赘”,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力辩以“尊德性”为先。这种学术分野,与当代学界近年的“思想”与“学术”之争,颇有异代同调、契合暗通之处,堪引以廓清今日之喧嚣与迷茫。鹅湖数日,朱陆双方细参异同,各抒己见,反复讲论,

但最终彼此存异,不合而罢。此后两家门人,各有所宗且互竞争雄,恰如两水分流,双峰并峙,在思想史上流衍、弘大为程朱与陆王二大学派。而双方于此颇颇互异之中,又不乏同情理解之心:朱熹晚年颇悔其支离训诂之失,而陆子不久亦有自责“粗心浮气”之语。所谓学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有克己之勇与服善之诚,此诚学人戒偏戒执之至道和现代学术精神之首端要义,与当代学人所谓“于己理论彻底而于人学术宽容”一说,不亦有精神相通之处乎?至于其他,如古代士子问道游艺四方的良好风习、于民间书院中接“学术地气”而使个体元气酣畅之追求、讨论天理心性之类形而上问题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想像、学术对手相互切磋砥砺的进学之道、“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学术胸襟等等,凡此“鹅湖之会”中所荷载之种种,皆为值得我们今天弘扬推重之优秀学术传统。由其光大的古代学术会讲制度,在近现代发展为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成为推动学术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与动力。但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在于,“鹅湖之会”所蕴含的学术精神,无疑有望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历史资源与一剂针石良药。质言之,“鹅湖之会”之所以被定格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会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士林佳话,并非因为其所具论百世不易,而乃因其藉争鸣以激荡思想、繁荣学术之优良传统为百世不可易者。逝者如斯——“鹅湖之会”早已超越了其具体论题,而逐渐凸显出其象征之意义:它所孕育的良好学术机制和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空气,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这一事关学术发展的“元问题”,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机制问题、学术“本土化”问题、“中国话语”问题等等,在时下复杂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一种发人警省、促人深思之历史一现

实关联性。所谓“赋新思于旧事”，“鹅湖学术丛书”接续于历史久远厚重的人文传统，而着眼于现实坚韧有力的学术建设，并深深期许于未来别开新局之文化前景。作为当代出版人，此等高远标杆，虽或有不能至者，但始终心向往之。

近十年以降，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学术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历80年代之激越蹈厉、90年代之沉潜蕴积并经跨世纪苍茫心绪之过滤淘洗，中国学术正借全社会创新之主旋律而深入精进。新世纪清明宽阔的学术舞台，正期待着当代学术中坚勇毅担当、践履自任。“鹅湖学术丛书”试图在此推波助澜，激荡风气，以促成新世纪中华学术之“预流”。在这个大的出版宗旨之下，我们并不想从学科内容上为丛书划定绝对明显的范围——如果一定要说有所限制，那我们想可以概括为偏重于人文而扩大至整个社会科学；而从特质上说则不妨特意提出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三原则”，以此有别于充斥坊间之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于重复堆垛而毫无新创之泡沫学术。

上承八百年前“鹅湖之会”学术民主之精神，适逢中国学术迈向繁荣新创之盛世，“鹅湖学术丛书”贯通历史当今，占尽天时地利，吾等编辑于此深感大幸，同时更觉有重责。志在学术之心意殷切，而常恨个人力气之绵薄，深恐有负士林学界之厚望，由此尤望天下学人同道乐于成人和之美，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共襄此旨在提升中国当代学术人文境界之善举，庶几可望构筑一当代学术之“公共空间”。

聊作以上赘语，以为启动“鹅湖学术丛书”之开场锣鼓。

国功 景琳

二〇〇一年五月

导论 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

—

我在本书中试图重新讨论一个人们熟知却未必重视的问题,即现代中国“文学”是如何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制”出来的。正如特意要为“文学”打上双引号一样,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仅仅限于观念的领域。通过对中西方文学历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显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一个名叫“现代”的幽灵的神秘介入,各种力量(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观念的与制度的……)开始簇拥着“文学”,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塑造了“文学”。因此,将“文学”作为“现代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检视、分析它的历史构成与现实构造,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自觉承担的任务。一个人或一本书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个宏大的任务,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正面触及到这个任务。就像本书的副标题“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所显示的,我没有把问题的讨论局限在文本(理论的和创作的)层面,也要求自己突破“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的论述框架,更多地关注制度层面的因素。为

了有力地回答“文学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来理解文学?”和“文学通过何种渠道来完成自我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在生产的过程中如何维持自我的同一性?”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我把知识分化、学科形成和课程结构这些知识与教育的制度演变作为了讨论的重点。在本书中,“现代‘文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作为现代知识的‘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简化,相反,这样的讨论更可能把问题引向深入和复杂。即使认定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更多的时候是以“知识”形态现身,那么也需要挖掘“知识”背后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权力的“痕迹”,凸显“知识”最终可以落实、储存和传授的制度性保护,寻绎“知识”在使用者和思想者的内心世界里的细微变化,并且指出“知识”在跨文化和跨语际传播中产生的误解、差异与创造性的挪用。很显然,作为“知识”的文学并非一定是凝固的和形而上学的,关键是如何发现制度中潜藏的个人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揭示出的制度与生活世界的辩证关系。

这就对本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既是知识社会学的,恰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的:“我们将从这一事实出发,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①这段话说明了探索一个术语或概念的丰富的语义史应该遵循的路向:对任何一个术语或概念的不同策略性使用,同时呈现出这个术语或概念建构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它在现代中国的“语义”变化和差异同样需要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向度上得到解释,而且这个概念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诸多分歧,又容纳了由西方途经日本辗转传译来的跨语际含义,就更增加了解释的困难。何况梳理概念意义的变化,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某种对概念的“本质化”理解,以避免交流之间产生太大的“误解”,而是希望借此对概念形

成、流通和建构过程的审视,达到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样的工作假设已经超出了“知识社会学”的范围,我真正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文学”观念和这一观念得以确立的外在条件。“文学”既然是现代合理性分化的产物,并且内在地成为了现代知识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文学建制”,即“文学”是如何参与到对“现代社会”——在现代中国常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诉求——的想像性缔造的?在方法上则需要把文学史、思想史和制度史,以及文本解读、话语分析和历史阐述有机地结合起来。

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制度时,曾经批评过简单地以“思想史”或“观念史”来驾驭“制度史”的做法:“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于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复更多所误会。”^②这提醒我们要注意思想和制度之间的错综关系:思想的落实必定需要依赖制度性的保护;而制度的沿革变化,若不从思想上加以说明,则往往流于史实的铺陈,无法呈现内在的理路。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依存关系下两者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思想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体制收编;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反抗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这就涉及到“现代性”无法克服的悖论,必须放在更宏阔的语境中才能加以理解。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两者融会贯通,正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标。

二

自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极具解释力的文学史范畴提出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词的使用频率大为下降。因为,如果“现代”只是一个以“1949”为标记的时间概念,那么从“文学史时间”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显然多少削弱了一些人为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文学在20世纪前后一

百多年里的变化的考察,其整体性和有效性也大大增强,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的青睐;而“中国现代文学”免不了地沦为一种“过气”的说法。可是人们同时又不难注意到,在学科分类与学科建制上,“中国现代文学”我自岿然不动。我以为,也许现在是时候了:要么干脆放弃“现代文学”一说,使“20 世纪中国文学”名正言顺地进入学科之中;要么保留学科统一的名号,并为“中国现代文学”重新灌注“生气”。

我的看法不言而喻。理由是“20 世纪中国文学”正像它的提出者所自觉的那样,不但是为了“打通”旧有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要把 20 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③而如今则格外清楚,所谓“视野”,既意味着崭新、重大和深刻的发现,却也隐含着另一层的含义:它自有其盲区,自有其“视野”之外的大片没有为它所发现的领地。易言之,“20 世纪中国文学”未曾——而且在它提出的当时,也不屑于——涵盖所有在 20 世纪这一物理时段发生的文学实践,“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一整套建构文学史的观念和框架,它并不等于“20 世纪中国文学”,即在 20 世纪中国发生的所有可以命名为“文学”的活动与实践(当然,如果进一步追究,那么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也是一个急待清理的问题)。这样,问题就接踵而来,“20 世纪中国文学”凭什么把另外一些发生在这个世纪的文学实践排斥在外?实际上,这种追问就是有关“现代性”的追问。倘若我们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文学现象(这个工作自 70 年代末以来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边界越扩越大,“加法”越做越多,或者劳神费力去重新界定、解释所谓中国的“20 世纪”性,结果是“20 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拥有的革命性反倒可能流失。那么,还不如还“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历史性概念的本来面貌,重新拾起一个早已有之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文学”。

看起来这像是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名号之争,但只要想想自8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学科发生的危机,以及学科中人已有的那些对危机的应对,就不至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在90年代初期的文化语境中,在“学术规范”的话语压力下,无论是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叫做“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都成为了“80年代学术浮躁”的重灾区,成为了最空谈“思想”、最没有“学问”的领域。所以,“反思”的结果正如一位80年代被视为“新锐”的学者在90年代出版的一部著作的扉页上写道的:“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④由此,不约而同的几大举措是,或者自觉地将“20世纪中国文学”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中去,使之成为中国千年文学史的一个不算太过光明的尾巴;或者一味地把“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经典化”,即根据某种先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挑选一些似乎堪与《古文观止》或《唐诗三百首》媲美名篇佳作加以封闭的艺术分析,以供后人品评鉴赏……在我看来,这一切无异于饮鸩止渴;也许作为大学文学系的一门科目,它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也许从业人员获得了“自救”,成为了这个科目的“专家”和“学者”,可这个学科却会消解得更快。因为,假如现代的某一名篇可以像唐诗宋词那样完全剥离了语境(唐诗宋词难道真的可以这样吗?)来作静态的赏析,那么它写在唐朝、宋朝和民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天然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还要“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科呢?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学科甚至学术内部。之所以在千年中国文学史中独立地划分出一块所谓“现代文学”来做专门的研究,那是因为“现代性”问题深刻地介入其中的缘故。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

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反过来看,倘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漠视甚至无视了 20 世纪前后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实践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放松甚至放弃了研究者自身对于现代生活的鲜活的当下体验,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无须也无法存在了。我们做的也许还叫“文学研究”,但很可能已不是“现代文学”研究了。固然,研究需要一定的规范,但规范是在研究的展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应该成为先在于研究的逻辑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80 年代“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对今天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仍然极具启发作用。“20 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将“20 世纪中国”与“文学”相勾联,自觉地将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相联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譬如在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中,作者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虽然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性关系,依然是在“走向世界文学”的乐观基调下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相当关键的所在,是一个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路径和起点。^⑤不过问题在于,在 80 年代,“现代”是一个不言自明、未经反省的普遍化概念,“现代性”是一副单一的面孔,并且在“现代化”话语的笼罩下晦暗不明。因此“20 世纪中国文学”对 20 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实践的梳理,今天看来,颇多滞障难通之处。最明显的是,它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为何?”这一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一种未曾自觉的“现代性”来读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时又以一种不加反思的“文学性”来读解“20 世纪中国”,这就造成了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双重窘境。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明确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

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⑥。这一论述正确地点破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秉持的“现代观”(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数概念:这个世界有多种“现代性”存在,那么所谓“现代观”就是某种“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态)的核心,并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现代性”的追问,突破了纯粹文学及其批评研究的框限,打通了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真切关联,落实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密切联系,的确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空间。要讨论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当然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文本上,因为“民族国家文学同其他的社会的语言实践密切关联,相互渗透。除创作和批评外,它的实践范围还包括出版机构、文学社团、文学史的写作、经典的确立、统一评奖活动、大学研究部门有关学科和课程以及教材的规定等”^⑦。

刘禾之所以将中国“现代文学”简单明了地称之为“民族国家文学”,她是为了把“民族国家文学”以外的文学实践,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重新纳入研究的视野。譬如她对“纯文学”的解释:“如果‘纯’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独立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命名的颠覆性”^⑧,就很具启发性。不过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化,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说法,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因为“共同体”既是有界限的,同时它又对一切能读懂它的语言的人们敞开,所以,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的印刷语言与印刷文学,直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幅度,在这个幅度之

内,虽然大家都素未谋面,但“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通过“文学”塑造出来。安德森说:“小说无声地、不断地渗透到真实之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共同体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⑨依据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想像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也是所有 20 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民族国家文学”如此,所谓“纯文学”以及其他“非民族国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安德森在他的新作《比较的幽灵》中继续探讨小说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联系,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永远紧密相连的,小说并非“总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再现民族的真实和真理”。从欧洲的小说传统来看,到 20 世纪中叶,小说的类型业已变得繁复多样,那种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直到托马斯·曼等把小说视为民族生活的代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⑩他的重新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也丰富了我们重新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和言路。具体地说,“民族国家文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批评视野,却并不能内在规定某一类文学的性质。文学实践是开放的,既然没有纯之又纯的“纯文学”,那么,“民族国家文学”不妨以民族国家意识以外的视角来解读,而被打入“另册”的其他文学更不妨以“民族国家文学”来加以观照。譬如发生在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新文学”争夺文坛“领导权”的斗争,究竟是不是以一种“现代性”压抑另一种“现代性”而收场的?更何况透过争斗的表象,它们是否在背后还分享着某些共同的资源?譬如作为起源的“小说界革命”,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逐渐成形的职业观念和具体的写作手法与技巧……

如此拓展论述的空间,自然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是多向度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一百多年以来至今仍在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渴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宝贵经验的艰难表达……它内在包含了诸多无法被知识化和客观化的内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